

大学生创业失败归因分析

——以“天行健”和“易得方舟”为例

段锦云^{1,2}, 简丹丹^{1,2}

(1. 苏州大学心理学系, 江苏苏州, 215123;
2.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天行健”和“易得方舟”等大学生创业失败案例宣告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学生创业狂潮开始走向理性发展阶段。深入分析这两个大学生创业失败典型案例, 可知创业经验缺乏、压力承受力不够、拥有资源和资金少是他们创业失败的直接原因。此外, 在创业过程中出现反失败偏差、过度自信和承诺升级等, 也是他们创业失败的常见认知根源。

[关键词] 创业失败; 归因; 过度自信; 承诺升级; 反事实思维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1)02-0091-08

一、引言

随着大学生创业的第一家公司“天行健”人去楼空、上海交大学子创业中心被别家公司收购、清华创业园因过半学生公司倒闭而被戏称为“破产园”, 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热潮进入深秋, 从“一窝蜂”的盲目推崇到开始对其进行理性分析, 从而冷静地思考总结其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

1998年, 清华学子首次创办“视美乐”、“易得方舟”等公司后, 在校大学生创办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由于种种原因, 许多“学生公司”成了“兔子尾巴”。华中科技大学在校生李玲玲1999年获得10万元风险投资, 号称“全国首家风险创业投资受益人”, 注册创办了武汉天行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年后, 这家公司帐上只剩100多元, 创始人只得黯然离去另寻出路; 在北京, 号称中国大学生“休学创业第一人”的鲁军、童之磊和马云等“易得方舟”清华创业团队早已离散, 当年热极一时的Fanso网站也不复存在; 上海首家学生创业公

司 - 上海交大学子创业中心在经历了8个月的艰难经营后, 被人收购, 为轰轰烈烈的学生创业运动迎头浇了一盆凉水。据统计, 由学生创办的16家企业二期风险投资到位率为零, 有1/4被出卖或被兼并, 有1/2资金未产出, 学子创业大多出师未捷(《国际金融报》2000年10月29日第三版)。

应该看到, 大学生创业具有自身明显的优势, 他们拥有创新思维, 且大多数项目的科技含量高。但其存在的先天不足也显而易见, 如缺乏市场经验和资金不足等。所以, 学生创业往往虎头蛇尾, 无疾而终。究竟哪些原因导致了大学生创业的失败? 什么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创业失败? 这是我们以期解决的问题。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大学生创业失败典型案例, 从中提炼直观素材, 结合国内外创业研究理论对大学生创业失败作归因(attribution)分析, 以期为避免大学生创业失败, 引导创业成功提供理论指导。

二、创业失败归因研究概述

[收稿日期] 2011-02-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9YJCZH08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902056); 苏州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项目及苏州大学重大项目

[作者简介] 段锦云(1980-), 男, 湖北大冶人, 工业心理学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创业管理与组织行为学; 简丹丹(1986-), 女, 福建龙岩人, 应用心理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创业管理。

以往较多学者关注导致创业成功（而非创业失败）的因素^[1]。在个性特质上，成就动机（need for achievement）、创新性（innovativeness）、压力承受力（stress tolerance）、自我效能感自主性（autonomy）、自发性（initiative）、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内控性（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和机会捕捉能力（opportunity recognition）等因素都会影响创业行为的发生和创业的成功；在环境因素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个人所拥有的资金和经验等资源因素以及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等都被证实影响着创业的成功。成功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仰慕，而失败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然而，殊不知任何一个人、一类事业的成功后面都是由更多的失败所构筑。可以说，失败（而非成功）才是普遍现象^[2]。风靡至今的《大败局》一书对国内包括“巨人”、“爱多”等巨星企业陨落的过程做过详细报道，自此，创业失败现象在国内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创业失败的归因研究多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为基础^[3,4]。Hayward等（2006）指出，狂妄自大的创业者做出资源分配的决定，这样会提高企业失败的可能性^[5]。Van Gelder等（2007）证实了Hayward的观点，并指出创业者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追求及时回报，而不是详细的、长期的战略计划^[6]。失败的企业家设定的目标大多不具体且没有挑战性，以及人力资本化程度较低。因此，创业失败是由创业者犯错或缺乏能力所致。相反，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创业失败并不是创业者的错，而应该归结于外部因素（如运气）。例如，Carter和Wilton（2006）指出，政府未创造出支持企业发展的合适的金融、法律以及政治和经济环境会导致创业失败^[7]。又有研究表明，单就创业失败现象以及创业活动水平而言，很难得出情境一致性结论，相反应考虑不同的区域体制框架的影响作用^[8,9]。Vaillant和Lafuente（2007）进一步指出，不能将区域仅分为农村和城市，因为每个类别里都可能存在关键性差异^[8]。

另外一种归因视角是借用Higgins（1998）的规则聚焦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该理论提出两种聚焦导向：促进导向

（promotion focus）的创业者倾向于转移，而预防导向（prevention focus）的创业者倾向于坚持。因为前者更为关注积极结果，因而会快速改变决策。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两种导向中哪种更容易成功，尚未得到充分证实。有意思的是，大量的案例研究发现，创业作为一个过程并不见得“执著”的人就容易失败，相反更容易成功。有学者指出这和决策情景、备择方案的特征有关，两种导向在不同时期各有优劣。

从基于认知观的行为决策视角探讨创业失败是近些年涌现的一个新方向，该视角源自Simon的“有限理性”观，阐述创业者固有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如何导致创业失败的过程。该视角的创业失败解释理论包括反失败偏差效应（the effects of an anti-failure bias）、过度自信理论（over-confidence theory）和承诺升级理论（the theory of escalating commitment）等。

上述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当下热门的大学生创业现象及其失败原因。本文将分别阐述“天行健”和“易得方舟”案例，然后结合不同的理论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三、大学生创业失败案例

（一）案例一：天行健

1. 创业者

李玲玲从上高中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数十万字作品，还出版有诗集《为梅等你》。她是宜昌市作家协会会员，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校报记者、校电视台新闻部长、副台长；校夏雨诗社社员，并在多家新闻媒体做过兼职。1995年，年仅17岁的李玲玲就读于湖北省枝江市第一中学二年级，她发明的高竿喷雾器，获得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1996年，18岁的李玲玲如愿以偿地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1999年4月，她发明的防撬锁在举办的中国专利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她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文科女生。而此时媒体也对此事进行大量的报到，如华中科技大学校报称“我校新闻系96级的金点子姑娘李玲玲，继高竿喷雾器等多个小发明获奖之后，再次为我校争光，捧回了

第七届中国专利博览会金奖”。同时玲玲及她的专利也引起了武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世博公司的注意。

2. 创业过程

世博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是一家官办民营性质的企业。该公司有专门用于转化科技创新项目的投资基金,每年为2000万。为了使投资既得到回报,又起到拉动新机制运行的作用,公司决定设立大学生风险基金,目的在于推出一种全新的科技产品动作理念。面对合作邀请,李玲玲是怎么考虑的呢?据报道,有人曾想以60万的价格购买李玲玲的两个专利。而李玲玲则表示:“如果卖掉的话,别人到底了不了解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个疑问。但我自己肯定了解自己的发明创造,我自己更知道怎样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并推向市场,并加以改进。”世博公司与李玲玲一拍即合,并于1999年7月签属了协议:世博公司出资60万成立天行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而实际到账10万元)。李玲玲则靠专利入股(世博公司占60%的股份,李玲玲占40%的股份),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目标则是将李玲玲的两种专利产品化和市场化。

双方协议,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李玲玲,独立负责公司的经营活动;世博公司监督风险金的使用并承担全部投资风险,同时为“天行健”公司无条件提供贷款担保,如果李玲玲创业失败,他们将不再追索风险金及收益。也就在这时,各路媒体轮番炒作,李玲玲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10万元+大学生”甚至被炒作为一种创业模式。先是湖北省的媒体“近水楼台先得月”,前来对李玲玲进行专访的报纸、广播、电视台一个接一个。湖北日报则在重要版面对李玲玲进行报道:“她是我国大学生创业第一人,是第一个吃螃蟹者。”长江日报认为“首例风险投资出现在武汉,是我市教育事业迈向新台阶的标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记者则从办理公司的工商注册到在学校上课,都一直跟着李玲玲,摄像机镜头从来没有离开过。据说,仅半年多时间,世博公司就收集了厚厚两大本关于李玲玲的报道。

3. 创业失败

不到一年,就传来“天行健”关张的消息。据说关张的原因是投资方停止注入资金,公司陷于瘫痪。到2000年7月天行健公司帐面上只有100块。同时,世博公司没有经过董事长李玲玲的同意,就通过媒体发出“天行健公司因经营不善,将于2000年10月被拍卖”的公告。世博公司总经理王一鸣对记者说,对于天行健公司而言,除此之外,“似乎已别无选择”。据一位记者描述:世博公司为李玲玲提供的办公室已是人去屋空,大门紧锁。据知情人告知,天行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运营了,李玲玲已去了她创办的新公司另图发展。

李玲玲第一次创业失败,当事者双方各有说词。世博公司:世博公司成立伊始,也想有所作为,急于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正好当时李玲玲的两个专利获奖(高竿喷药器获“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防撬锁获第七届中国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盛传全国,所以对李玲玲及专利很有兴趣。而世博公司既没有请相关专家对专利发明进行技术论证,也没有对李玲玲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职业经理人”进行考察,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天的时间就作出决策。公司在“天行健”开业之初即将承诺的10万元风险投资全部拨付,但“天行健”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用到了出差、招待和工资上,仅有万余元用于产品开发。过于草率的公司化运作为后来的分歧埋下了祸根。李玲玲的天行健公司仅有3人,除了李玲玲,其它员工总是不停地流动,而公司也总是做做停停。在公司的管理运作上,世博公司尽管是大股东,但世博的意图却贯彻不到公司的运作中去,李玲玲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世博公司对高竿喷药器试模后的产品很不满意,说像地摊货。

李玲玲:对于世博的指责与批评,李玲玲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她对世博公司投资的初衷就表示过怀疑。当时自己的“热闹”,与投资方的行为也有关系。“很多采访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只是世博单方面在行动,我的照片也未经允许就登出来了。”如果世博公司只是想扩大天行健的影响倒也情有可原,可事实上,这个后来很快倒闭的投资公司的目的似乎只是想为

自己招来投资。在一次董事会上，世博的人对李玲玲说：“你现在完全可以招来1000万的投资。”李玲玲回答：“可我要的是生产自己的专利。”李玲玲说道，天行健公司的办公室就在世博公司的办公楼内，“除了我，其他员工包括财务都是它派来的，我的一点举动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世博就会有人通知李玲玲，要她“过来汇报一下”。“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我只对董事会负责，可世博的一个随便什么人都好像想指挥我。”李玲玲说。

她说，世博与天行健当初签订的协议里，表明要对天行健投资60万，可真正到账的只有10万……李玲玲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当作了工具。她在后来的回记中写道：“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一个公司在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都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宣布拍卖？为什么签了字的资金还无法到位？为什么没有经过任何采访，报纸就可以上头条？”

离开“天行健”后，李玲玲曾在当地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实践证明，我作为大学生创业的具体实践者，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广告意义上的‘概念’操作。”“大学生风险投资正因为是新鲜事物，天行健注定成为一种实验品。现在看来，公司从我与世博签订协议、草拟章程、融资渠道，到产品开发、拓宽发展空间等等，都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

（二）案例二：易得方舟

1. 创业者及创业过程

1998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20来岁的刘颖，在16号宿舍楼519活动室里，仅仅依靠一台老式的电脑、一份热情和一些不确定的想法，创建了他的个人网站“化云坊”。仅用6个月的时间，它一跃成为教育网内最大的个人网站之一，甚至南方一名女大学生老远赶来求“站长”刘颖签名。紧接着，鲁军、童之磊、马云、陈曦和刘颖5少年在宿舍的仓库里把化云坊个人网站演绎成易得方舟公司。作为“中国大学生自己的网站”的易得方舟的英文名字FANSO，取名来自于这么一句话：“We are fans, so we do it.”

鲁军，1976年生于浙江鄞县，1993年至199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1998年至1999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途休学，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休学创业的大学生。

1999年4月，鲁军和热能系毕业生俞弛以及陈曦商讨进军ICP行业。

1999年5月，在教育网上开办颇有名气的“化云坊”个人网站的刘颖及其团队还有童之磊加入进来，形成了易得方舟的团队雏形，易得方舟的产品理念也得到了初步完善。同样是在这个5月，“清华大学第二届学生创业大赛”诞生了清华首批学生创业团队，其中就有易得方舟。

1999年7月18日，清华大学正式批准鲁军、刘颖的停学创业的申请。

1999年8月，易得方舟获得了第一笔私人投资，并迅速从一个10人不到的创业团队发展到拥有60余名员工的商业公司；同样是在这个8月，清华创业园开园，易得方舟成了入驻的11家学生公司之一，鲁军出任总裁。

2000年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易得方舟隆重推出其“Campus Age中国高校电子校园解决方案”，赢得社会各界的助威。

2000年5月，易得方舟成立了中文在线，并推出“股权换版权”的理念，该理念使它包揽了巴金和余秋雨等诸多优秀作家的网上版权，作家丛维熙称易得方舟的创业者们为“来自天堂的文学天使”。易得方舟鼎盛时网站的日页面浏览量突破300万，注册用户达到15万。易得方舟和鲁军、童之磊等创业者也成为业内外关注的焦点，不少媒体称他们为“网络英雄”等。

2. 创业失败

2000年6月，正当易得方舟蓬勃发展之际，恰逢互联网的冬天。易得方舟在两周内，风险投资被撤走。2000年底是易得方舟最艰难的时期：它首先面临的是人事震动——马云走上了职业经理人的路；陈曦另立山头，办了一家技术公司；童之磊在做他认为具有“史诗”意义的出版革命。紧接着则要面临经济问题，公司40多个职员等着发工资而账上只有几千块钱。

2001年,风雨中的易得方舟遭遇了部分媒体的“围剿”,诸如《中文在线还在线吗?》《中文在线去日无多》、易得方舟破产等等报道,批评易得方舟纸上谈兵,从未干过实事,不了解资本市场的天高地厚,创始人刚愎自用,典型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本想沉默的易得方舟出来好一番解释才算平息。在易得方舟长期无法登录之际,易得方舟的CEO鲁军表示,他们暂时放弃了网站,等到以后时机成熟,也许会回来做网站,但那时候肯定是另有模样,因为易得方舟必须向中国教育在线交纳每个月12万元的服务器托管费,易得方舟目前状况下觉得这笔费用太高。这无疑也反映了易得方舟所处的困境。

据称,曾经有人想劝鲁军放弃易得方舟,重新再来,而且也有猎头相中了他。但是鲁军却表示不愿放弃易得方舟,他说道:“如果我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再开一家公司,对个人是不错的。但我必须为投资者的每一分钱负责,不能因为有困难就撤。更何况,现在的公司已找到良好的商业模式,正在大调整,进入快速发展轨道。”鲁军不承认易得方舟的失败,但他要承认的是,他们已经基本放弃了网站。有专家指出,清华大学的光环是易得方舟从2001年互联网的冬天喘息至今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易得方舟团队的作风和清华大学的校风一直格格不入,因此,易得方舟从一开始就避免不了失败。这对中国的学生创业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马云、童之磊、陈曦已经离开了易得方舟这艘船,当他们回头看这艘风雨中的船和老船长鲁军时,百感交集。马云说,易得方舟与其他任何一家公司一样,都必须经历市场的考验,因此,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很正常的。他认为,易得方舟本没有故事,只是外界赋予了它太多的含义,在常人看来,易得方舟代表了那个时代学生创业的梦想,成了上个世纪末的某种符号,所以,易得方舟一直负重前行。但市场经济中,不会因为你是学生创业公司,就给予你更多的眷顾。“作为它的股东,我真心地希望它越走越好,但如果有一天它消失了,我也会很平静,因为这就是市场,这样的事每天都

在发生。”如今IT业最年轻的CEO童之磊不愿提及往事,他更多地表示,他要折翼仍飞,为他的网络出版业不问收获地干上10年。

其实,早在2001年3月27日,就有《易得方舟沉没,大学生创业失败率高》等关于易得方舟网站倒闭的消息传出,但3月27日北京易得方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马上发表名为《易得方舟网站倒闭之说系误传》为题的声明予以否认。因此,易得方舟的危机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四、案例分析:理论视角的大学生创业失败原因解析

大学生创业属于创业活动的一个特殊门类。大学生在成就动机、革新性、开放性、自我效能感和机会捕捉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在拥有的资源、社会经验和压力承受等方面却明显不足。因此,有些大学生创业成功了,而更多地——正如其他创业人群一样——是失败的。大学生创业失败有其内部自身原因也存在外部因素。以下将从社会归因理论(social attribution theory)、反失败偏差效应、过度自信理论和承诺升级理论对大学生创业失败进行理论水平的分析。

(一) 社会归因理论视角

社会心理学家关于因果关系归因的研究是以Heider(1958)的研究为基础的^[3],归因理论视角的创业研究主要探讨内部、稳定的成功归因是否显著影响创业者的坚持性。另一代表性归因研究者Weiner(1979,1985)的归因理论提供了三个维度:因果关系所在控制点(内源vs.外源)、稳定性和可控性^[4]。Weiner, Russell和Lerman(1978)提出,因果关系点(locus of causality)、假定原因的稳定性以及在情境中活动者的意图,组成的三维因果解释会对创业坚持性有显著影响。例如,如果个体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为内部的、稳定的,以及人为的因素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的、变化的、偶然的因素,他们将会继续坚持这项活动。

真正的失败并不是失败本身,而是放弃了对成功的追求。同理,大学生创业最根本的失败是放弃对原有创业梦想的追求。根据归因理论,在创业过程中,个体如果将成功归因为内

部的、稳定的因素(如能力较强),而将失败归为外部的、易变的因素(如运气不好),那么就会坚持创业活动。在案例中,“易得方舟”和“天行健”初期取得的成功很大部分来自于外界助力,如社会的关注和外界资本的注入等,这本身无可厚非。而当面临挫折与失败时,虽然两家公司的创业者都将原因归结于“资本缺乏”等外部的、变化的因素,但他们同样也意识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以至最终无能为力将原有创业活动进行到底。

(二) 反失败偏差效应视角

此外,我们可以用反失败偏差效应来解释大学生创业失败现象。反失败偏差是指个体认为冒险行为走向消极结果是不可取的,这种偏差会导致各种错误,如确定偏差(confirmation bias)和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s)。不承认失败者会因害怕失败而调用前失败偏差(pre-failure bias)^[10]。因为,为了逃避由反失败偏差导致的各种错误,前失败偏差会打破试误学习圈(创业者的学习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有些创业者将失败知觉为停止努力的信号,而另外一些创业者则认为失败是新的契机,这取决于创业者的新交易承诺思维(new transaction commitment mindset),即进行新交易的意愿程度^[11]。承认失败的意愿存在引导作用(cathartic effects),这种作用与通过学习降低认知偏差相似。创业者若不承认失败,就不能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也就更不可能识别机会,因为前失败偏差会限制新交易承诺思维,如此循环,创业者最终面临的的就是关门倒闭。

反失败偏差在初创企业的创业者身上表现得较明显,而对于社会经验不足、踌躇满志且一味追求成功的大学生来说,失败更是不容许的。因此,大学生创业高失败率与此不无相关。对于曾经“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以及一向顺风顺水的李玲玲来说,在其字典中没有“失败”二字。李玲玲一心想着“生产自己的专利”,也始终不愿承认公司的倒闭与自己专利的失败有关。她将创业失败归于世博公司的投资初衷及其行为,并认为自己“沦为广告意义上的‘概念’操作”。面对一系列的消极结果,李玲玲最终放弃天行健而自谋出路。易得方舟的创业者

在“互联网的冬天降临”之际就各奔东西;其CEO鲁军在公司即将倒闭时仍然声称“现在的公司已找到良好的商业模式,正在大调整,进入快速发展轨道”。这一系列行为都能证明他们是不愿意承认失败的,也因此不能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挽救濒危的新生企业。

(三) 过度自信理论视角

最近几年,学者们将认知心理学引入创业研究领域,并用“创业认知(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来描述创业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是指个体用来评估、判断或决策以及创立和发展企业的知识结构^[12]。创业认知研究主要强调创业者对启发式与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的使用。过度自信是个体在使用启发式时出现的一种偏差^[13],它是指个体与他人相比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证据表明,创业率与过度自信积极正相关^[14]。过度自信鼓励个体探索创业机会,但它也会导致资本不足企业的创立^[5],这往往容易导致高停业率。De Meza和Southey(1996)指出,创业失败是由于滥用启发式(如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导致的^[15]。而Koellinger等(2007)则进一步证明,创业过度自信与新生企业生存机会的负相关存在跨文化一致性^[14]。

易得方舟创业者顶着“清华大学”的光环,天行健的李玲玲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众多天生优势造就了他们对自己的十足或过分自信。李玲玲希望亲自生产并推销自己的专利,面临世博公司的邀请,在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便“一拍即合”,导致“过于草率的合作”;鲁军和刘颖“靠一台老式的PC机、一份网民的热情和一些闪烁不定的想法”便“休学创业”。李玲玲的过度自信让她不愿接受世博公司在公司管理动作上的帮助,鲁军的过度自信使其意识不到危机的来临。此外,这些过度自信的行为也最终导致了两家公司的资本不足,如“世博与天行健当初签订的协议里,表明要对天行健投资60万,可真正到账的只有10万”,以至最后公司账面上只剩下100元(或700元);易得方舟创业者因“不了解资本市场的特性”,面对资本的无情,最后公司“账上只有几千元钱”。两家公司也最终因资本不足而宣告失败。

(四) 承诺升级理论视角

对于初次创业的大学生而言, 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就是大学生创业者如何面对沉没成本(sunk cost)。新创办企业起初必然会面临“负收益”。在创业者看来, 势必出现两种分化即“坚持-转移”^[16]。对此问题, 大部分的解释是创业者倾向于出现承诺升级(commitment escalation)效应, 即面对消极结果的不断出现, 仍然坚持继续投入或者继续坚守。这特别会发生在群体对最初的决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以至于形成了内部的高度责任感这种情况下。新近的研究认为, 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是失败创业者的写照, 而成功创业者善于分析形势, 选择在危机时坚持, 在不利时转移^[17]。

大学生作为年轻的群体, 作为初次创业者, 这种现象表现得尤其明显。李玲玲面对自己发明的产品给公司带来的负收益, 依然相信自己的产品是最棒的, 仅用少部分的钱来开发产品, 以至出现“地摊货”。世博公司也因对产品的不满意而停止注入资金。在易得方舟即将沉没之际, “休学创业第一人”鲁军依然坚守阵地, “船在人在”, 直到公司倒闭。鲁军以休学的代价进行创业, 在万众瞩目之下, 即使早期就已暴露出公司倒闭的消息, 鲁军仍然站在摇摇晃晃的易得方舟上而不愿“弃船保帅, 重头再来”, 并且表示只是“暂时放弃了网站, 等到以后时机成熟, 也许会回来做网站, 但那时候肯定是另有模样”。然而最终, 这种承诺升级式的坚持并没能挽救易得方舟。

五、结语

“天行健”和“易得方舟”等学子创业失败案例宣告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学生创业热潮开始走向理性发展阶段。客观来看, 大学生创业终究还是脱离不了一般创业活动的规律和特点, 如它的高风险性和它的高死亡率。正如俗语所言, 失败是普遍现象而成功是少数现象, 大学生创业现象也不例外。

大学生创业有其自身的优势, 但自身的缺陷也非常明显, 这些都成为创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创业经验缺乏、压力承受力不够、拥有资源如社会资本和资金少。由于没有创业经验和其它替代性经验, 这使得他们创业效能感缺

乏, 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也不够。同时由于接触市场的机会少, 因此导致他们捕捉有效市场需求的机会的能力也不足。这些都成为大学生创业失败的重要直观原因。

根据 Heider 的归因模型, 创业者(包括大学生创业者)大都把创业失败归因为机遇不济或努力不够等, 以此更好地自我辩护, 同时维持自己的抱负水平。而依 Weiner 的归因研究来看, 大学生创业失败更多归因于不稳定性因素, 他们通常认为下次创业一定成功或“如果...就会成功”, 这是一种典型的创业失败后的反事实思维, 也是一种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大学生创业者满怀热情, 一心想着成功, 这种无法正视失败的心态使得创业者不能积极面对失败, 从而一错再错, 直到公司倒闭。大学生自身的智力优势而导致的过度自信也带来了其自身的意识狭窄, 这也成为其创业失败的重要推力。此外, 创业过程中通常会出现承诺升级现象, 即便创业者感知到危险因素的存在, 他们一来因由惯性而不愿放弃先前的投入, 另一方面也想为先前的投入找寻理由, 直到企业破产才浪子回头。这些都成为大学生创业失败的认知解释。

研究表明, 有创业经验即创业失败经验的创业者, 再次创业成功的概率高于初次创业者, 这主要是创业效能感得到了提高, 同时获得了更多创业过程规则这种程序性内隐知识, 而这种知识不可以轻易传递给初次创业者。可以说创业失败为最终的创业成功提供了精神养料, 为下次创业的成功播下了种子。因此, 我们在惋惜失败之余, 还应该为大学生创业失败者鼓掌。同时, 我们也期待在国内大学生群体中涌现中国的盖茨、戴尔或 Facebook, 也期待更多的诸如“视美乐”等创业成功案例的涌现。

参考文献:

- [1] Shane S.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 and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1(12): 136-160.
- [2] Melissa S, Cardon, Christopher E, et al. Misfortunes or mistakes? Cultural sense-making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1-14.

- [3] Heider F.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Wiley, 1958.
- [4] Weiner B.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5, (92): 548-573.
- [5] Hayward M L A, Shepherd D A, Griffin D. A hubris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J].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 160-172.
- [6] Van Gelder J L, de Vries R E, Frese M, Goutbeek J P.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strategies of failed and operational business owners in the Fiji Islands[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7, (45): 388-400.
- [7] Carter S, Wilton, W. Don't blame the entrepreneur, blame the government: the centrality of the government i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enterprise failure in Zimbabwe[J]. 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 2006, (14):65-84.
- [8] Vaillant Y, Lafuente E. Do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condition the influence of local fear of failure and entrepreneurial examples ove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7, (19): 313.
- [9] Lee S, Peng M W, Barney J B. Bankruptcy law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 real options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257-272.
- [10] Mitchell R K, Robert J, Mitchell, et al. Inside opportunity formation: Enterprise failure, cogn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8, (2): 225-242.
- [11] Smith J B, Mitchell J R, Mitchell R K. Entrepreneurial scripts and the new transaction commitment mindset: Extending the exper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33(4): 815-844.
- [12] Mitchell R K, Busenitz L, Lant T, et al. Toward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rethinking the people side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 (27): 93-104.
- [13] Ucbasaran D, Westhead P, Wright M, et al. The nature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business failure and comparative optimism[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1-15.
- [14] Koellinger P, Minniti M, Schade C.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Overconfid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7, (28): 502-527.
- [15] De Meza D, Southey C. The borrower's curse: Optimism, fin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J].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 375-386.
- [16] 苗青. 基于认知观的创业过程研究[J]. 心理科学, 2005, 28(5): 1274-1276.
- [17] Sarasvathy S D.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26(2): 243-263.

[编辑：胡兴华]